

从“解释”到“理解”

——论现代哲学的问题转向

黄在忠

(厦门大学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古希腊时期，哲学以考察世界、为人类生活提供更好的实践指导为己任，但近代以来哲学的形而上学化却让它脱离了真实的生活世界而沉浸于对本质实在问题的追问当中。进入20世纪，哲学家们开始放弃过去的讨论方式，其中尤以后期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态度最为鲜明，他们努力把哲学的反思对象拉回到未被做出形而上解读的生活世界，实现从“解释”世界到“理解”世界的哲学问题转向，体现了一种现象高于本质的反本质主义倾向。

【关键词】哲学终结；现象学；此在

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在不断形而上学化的同时使人抽象化而脱离了原先的生活世界，并于20世纪面临被终结的危机。在寻找解决方法的过程中，由后期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实现的从“解释”世界到理解并尝试“描述”世界的转变，不仅是从“悬设”到“直面”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的态度转变，更是努力回到未被我们赋予各种形而上解读的世界本身，寻回哲学对生活实践的指导作用。

一、旧哲学的终结与新的转向

古希腊哲学从整体角度考察世界，从自我本身出发理解世界，以朴素直观的自然观回答世界的本原问题，目的是为了人们更好地生活，指导人际交往和社会行为。亚里士多德用实践哲学指代一种专门探讨人类实际存在行为的反思性学问，它指导和规定人们的伦理与政治行为，达到最高目的——“善”这一人的生存根基。

中世纪哲学以理性论证信仰，不再坚持对人的行为的指导和启示的哲学任务。近代哲学继续探求世界的本原，但它着重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企图追求知识的终极依据，形成了以主体征服客体的对待世界的特殊方式，导致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裂；它过分推崇理性更带来独断论，把人当作抽象的理性人，逐渐导致人的主体价值的迷失、人与世界的分离，无法理解对自身的生存的定义以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将一切都交给科学和工具理性来评判后果。另外，传统哲学家因致力于构建绝对理性的本体论哲学，而离开了人的世界去认识人和规定人，总是不断追问“是什么”，假设了一个“是”，这种提问方式预设了一个独立于人的世界的存在，人在生活世界面前只有

努力证明世界如其所是，没有根据自己的需要描述世界的自由。

康德曾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企图纠正理性万能的错误态度，但是他的道德哲学在实践层面仍具有先验普遍理性自律的预设，依然失去具体的生活世界的根基。黑格尔企图克服心物二元论，但却阐述了客观精神(理性)如何把握和创造万事万物并实现自身的过程，把自然和历史理解为服务于本质和规律的一种辩证运动，以虚设的外在于人的客观精神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企图用理性完满地解释和规定人的存在。黑格尔之后，叔本华和尼采的非理性的意志主义，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等，纷纷批判哲学长期的僵化，宣布传统哲学的终结。

20世纪初，由于整个关于世界解释的实在领域都被实证科学所占领，哲学研究的对象也被迫改变，转向对世界的科学陈述和概念说明，研究充当陈述和表达概念角色的语言。心理主义企图以现代心理学解释一切现象，把数学和逻辑学的基本法则解释和简化为人的主观意识或心理活动的结果，而数学与逻辑学在近代恰恰是哲学论证逻辑合理性的必要基础。借助现代数理逻辑，哲学开始涉足对数学的逻辑基础和语言意义的研究，逻辑既由语言体现，本质上便是语句内在及外在关系，语言的意义与逻辑规则相辅相成。更重要的是，语言的意义存在于事实、思想和语言之间，是人们在日常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既不属于物理世界，也不属于个人的心理世界。G·柏格曼认为，“所有的语言哲学家，都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这是语言学的转折，是日常语言哲学家与理想语言哲学家共同一致的关于方法的基本

出发点。”“认识论的转折”导致人们认为只有通过叙述我们的“心灵”或“理性”才开辟了叙述世界的途径；而“语言学的转折”则认为只有叙述语言，才是通向“世界”的唯一途径。

因而现代哲学将把目光转向对事物“如何是”的探询，而不是对事物进行“是什么”的提问；不仅要研究对象上转入对语言的分析，还要让语言所描述的对象从形而上学的世界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回答生存与现实当中的人身上，重新理解存在的意义；不仅意味着要放弃对现实背后的形而上学的意义追求，还意味着应该放弃对人和世界作为存在者的本体论预设，转而考察人是如何在现实当中存在的，是如何获得对世界的意义的理解的。

笔者认为，这不仅是研究对象上的转变，也是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它既是由几个哲学家的不同哲学所努力完成的，也是一个让新的哲学研究对象在旧哲学体系被拒斥之后得以显现的过程。

二、从“解释”到“理解”

理查德·罗蒂认为，最有用的哲学应该是“发现了在我们感到对某些目的是有用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与那些我们觉得对其他一些目的是有用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之间的区别，并用这个区别来替代古希腊在实在和现象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哲学应该以一种不同于传统本质主义哲学的讨论方式思考问题：现代哲学应当在什么意义以及何种程度和范围内重新回到人的生活？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世界而不是什么都没有？我们能否以新的态度面对生活世界的种种现象，以寻求理解的方式而不是以解释的方式获得问题的答案？

（一）胡塞尔“悬置”形而上学问题

胡塞尔企图为哲学寻求一个确定无疑的开端和基础，“使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他认为，意识对其本身来说仅仅是在我们意识活动中被明晰地给予或显现，世界相对于我们的意识本身来说可以是超越和不充分的，我们当然可以设想世界、意识不存在，世界本身只是纯粹意识的意向对象。因此，我们要对世界存在的素朴信念存而不论，摆脱过去对世界之客观存在的自然态度，直接“面向事物本身”，实现现象学的还原，专注于纯粹意识现象，从抽象的语言符号意义回到它的所指物的直观起源，探寻其绝对清晰的、自明性的认识论开端，专注于对主体的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的本质结构，用“先验自我”反思意识的存在，使意识变成能够赋予意义或进行意向性构造的真正主体，获得具有“绝对的、明晰的被给予性”。

由于人的意识不断流动，意识的行为和行为的主体——“我”也始终生存和伴随这种意识的体验流，不随意识体验的消逝而消失，“我”作为不断变化的体验

流之中的不变者，具有绝对的自明性。通过反思，“我”保证自己意识内容的连贯性和同一性，成为了纯粹自我或“先验自我”。“先验自我”通过赋予对象以意义，成为一切意识活动的基础，是构造一切对象世界的总根源，是我们进行“判断”的唯一源泉。“先验自我”及其生活就是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本身。意向性作为意识的本质特征，意味着世界本身并不是独立于意识而自在地存在的客观物，是意识的意向相关物。因此，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当中，我们只需直面思维现象本身，以主体在纯粹意识领域的反思，直观到先验自我，就可以构造一个自己的通体透明的意向性的世界，将客体世界的不明因素全部悬隔，世界的意义构造就是由自我来实现的。

由于知识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表达，我们的思维方式也需要语言载体进行传播，所以胡塞尔认为，意义的根源或基础是对语言意义的理解意识，即意义指向。一个语言表达式有意义是因为它被意义指向性的行为激活，否则它就无意义。当一个语言表达式所意指的东西或指称的对象直观地显现时，它的意义就获得了充实。因此，完整的意向性体验或行为就是使意义获得了直观充实，让所指对象得以直观显现，这种认识行为的意向相关物就是真理。

（二）后期维特根斯坦主张让哲学“回到日常语言”

世界的意义不仅需要通过先验自我的意识意义活动来实现，它还借助语言的表达来充实。

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过去的哲学家脱离生活世界，将哲学讨论建立在对日常语言的错误使用之上，产生各种奇怪的结论，他们对诸如“时间”、“空间”等种种名词产生困惑，探求它们的本质，可是在日常语言中，人们对于这些词汇的使用是清楚的，没有歧义。这种词汇上的混用和语义上的含糊性不是语言本身造成的，而是我们过去的单一图像指称的使用方法造成的，是过去企图寻找事物或世界终极意义并以此解释一切的形而上学的做法导致的。因此，哲学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哲学的研究就是要给语言的迷宫绘制一张地图，使人们对日常语言的用法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使人们努力澄清语言的用法，搞清楚哲学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从而消解这些问题。

维特根斯坦企图将语言带离哲学的困境，用综观的方式考察语言用法全貌，让语言回到其应有的使用环境当中。他将语言视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某种活动，并遵循着一定的规则，提出了“语言游戏”说。语言游戏是指“由语言以及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活动组成的整体”，玩游戏必须遵守规则。规则就体现着意义。句子和词汇的意义在于它们的用法，生活中不存在能够先验地被确定的意义。遵循规则是一种实践，语言使用的规则体现在语境下的公然性，在于回归到日常生活当中的多样的、

生动的、具体的用法。语言与世界事实并没有特定的一一对应，各个范围之间只有相似的某种特点，只具有“家族相似性”。只有找出不同的语言游戏的家族相似性，才能真正地达到确认不同的语言游戏的目的，找到不同语言游戏的玩法，也就是语言的用法。

维特根斯坦不承认词的意义是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语言的意义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性质和功能，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我们不必考虑或追问意义，只需去描述用法，因为用法本身就是一种赋予意义的行为。我们需要借助这种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综观式的考察，因为“综观式的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示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借助综观和描述的方法，维特根斯坦实现了哲学在日常语言哲学层面的方法论转变，并被后来的语言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

（三）海德格尔探讨生活着的“此在”的意义

胡塞尔主张，让哲学回到作为一切思考与哲学研究之前提的人的现实存在状态上来，从人的实践行为、日常生活出发去研究哲学问题，它与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游戏”回归生活的做法，都体现一种从解释“何物存在”到“如何存在”的转向。

海德格尔明确将哲学从解释“何物存在”转向了“如何存在”。他认为，过去哲学将存在当作无须加以追问的事实，脱离了生活和人自身，令“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一切存在者之外，超出存在者一切可能的具有存在者方式的规定性之外”，这是错误的。作为哲学范畴的“存在”是使一切存在者第一成为其自身的先决条件，它本身并不是存在者，也不是其他的某种独立的东西。一切存在者必须先存在才能成为现实的、确定的存在者，所以，我们应该追问存在者怎样存在，而不是什么东西存在，应回到对存在状态的研究，澄清和阐释它的意义。作为存在者的前提的“存在”是“人的存在”或“自我存在”，即“此在”（人）。我们不可能离开人的角度去指认和解释世界。世界是指“此在”（人）的世界，如果没有此在的生存，也就没有对世界的意义指认和理解，如同只有被人开辟出一片林中空地，我们才能看到被树林隐藏的树下和树林以外的东西。

作为人的“此在”会按本身的在世界上的显现（存在过程）揭示其存在的意义，将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此在”总是从可能性出发领会自身，对自身进行筹划。每一个人都需要在时间与存在这样一个开放型结构中理解自己，领会自己，筹划自己。理解是“此在”（人）的一切其他活动包括意识活动的基础，因此，理解世界只有在我这一主体面前被我的筹划、计划、可能性显现出自己时，才有意义。只有当“此在”使自己本真状态开展出来的时候，“存在的真理才能获得生存论、存在论上的规定

性”。人的理解与解释活动是人的整个生存活动的一个部分，理解与解释活动本身就是“此在”结构的展开，即人存在的一种历史过程。他的“解释”其实是一种展示，在解释当中展开自身，展示“此在”在人生与世界之间的可能性，在这种展开当中理解存在。

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生存状态的分析，就是要对人的生存状态做出解释，以他的此在存在论为基础寻求对人的生活的解释和理解。海德格尔试图重新恢复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哲学对生活实践的指导任务，将生活世界拉回哲学的论域内。

（四）伽达默尔呼唤能指导生活世界的实践理性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通过语言描述世界，“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既然人是以语言的方式来拥有世界的，那么哲学需要面向的“事情本身”就是展现自身于语言中的表现，也就是不被遮蔽的真理，被讨论的主题、真认识的“对象”以及正确理解的基础，就是我们要理解的文本或谈话要取得理解的对象或内容。

伽达默尔主张让研究者与由语言组成的文本进行对话，实现对理解的真理层面的把握，即一种历史的创造性视域融合。通过让研究者的现在视域与文本所包含的过去的或传统的视域融合一起，就能产生一个新视域，获得的新观念，让文本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达到有意义的统一，才有可能获得对文本真正客观的认识，也是对话的实质。理解的真实意义是由文本和解释者共同完成对意义的建构，这种理解和解释活动普遍渗透于和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方面，是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实践活动。“实践意味着全部实际的事物，以及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设定”，“是与生活相联系的一切活着的東西，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所引导的生活”。早期解释学就被作为一种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的实践指南来使用，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就是要寻找能够指导人们生活实践的理论，让人们能在真实的生活世界当中生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全面影响，技术逻辑和外为目的的机械活动，一切的制度和行为都逐渐以科学合理性为评价标准，技术合理性逐渐取代了价值和其他层面的合理性，成为人们的价值评判标准。伽达默尔指出，理性不仅指科技理性、工具理性，更重要的是与人的存在活动直接相关的实践理性、道德理性、社会理性即存在理性，哲学需要回到追逐人生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道路上，建立一个充满人的意义的世界拥有实践理性、实践智慧的人类生活，而这才是真正具有反思性的有意义的生活，才能保有人完整的价值。科学所代表的工具理性只是理性的一种运用，真正的理性是对包括认识活动在内的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反思和判断能力，

它指导着人类生活的一切实践行为,是一种实践智慧。

理解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它是特殊经验与人类基本经验的作用过程,指导这一活动的哲学本质上也是将个体经验与普遍经验融合,并在这种融合中让我们通过自身体验的直接性和不可替代性,这恰好证明了实践理性不能被一般性陈述或知识确证的特点,它具有体现实践者自身经验的特殊性,并面向人类所有的基本经验,具有指导人类生活实践的作用,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理解和摆脱困境的启示。人类生存的意义就是通过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影响来实现,就像从整体到部分又从部分到整体的解释学循环:“从整体出发规定着自己的部分也从它这方面规定着该整体。”这种相互解释的经验,才是存在的意义的真正基础。

三、转向的意义

在古希腊,哲学的本意即“爱智慧”,从整体上观察和认识人和世界的关系。近代以来的形而上学使哲学失去了具体实在的解释和描述对象,不能解释“存在”和“存在”的意义,这种抽象的哲学令我们的语言陷入空转,因而维特根斯坦主张让语言回归到它应有的使用范围,即日常生活上面;胡塞尔将形而上学的疑问悬置,专注于探讨自我意识的明晰性在实践当中对生活世界的意义构造;海德格尔将意义构造活动升格为对人的存在的理解,让语言成为实现和理解人的存在的重要工具。韩林合曾指出,“人类语言的特征,在于它是在坚固的生活方式,规则性的行事或在规则性行动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生活方式的核心是人们的规则性活动或者行动,即规则性的生活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只是一种遵循某种规则的生活方式,语言对哲学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其意义存在的方式。语言是人们赖以表达意义、描述世界的重要方式,它展开了存在的开放结构,使世界向人敞开。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在语言中去实现世界文化的建构,发掘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我们理解的存在,其实就是语言所陈述的内容,正是有了语言,人才会有意义,人的一切才能够被表达和理解。语言是有内容的存在。

伽达默尔抓住由语言所组成的文本的理解问题,将理解人的存在与世界的普遍意义联系起来,真正地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就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是人的存在的一种实践知识或者说实践智慧。在伽达默尔这里,“理解、存在与实践”成了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东西,回到了我们生存的世界这个论域。生存实践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活动方式和生存方式,成为我们证明自己存在的基本事实,生存实践本身就是生活世界与社会历史或构成了生活世界与社会历史,哲学的反思活动就必须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以实践理性反思人与

自身、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世界的意义不靠我们预设和追求来实现,而是靠我们以“直面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态度进行理解和描述而实现,这是对哲学研究对象进行从“除弊”到“直面”的问题转向,是从“解释”世界到“理解”世界的反本质主义转向,这种转向,把人所生活的具有实践意义的世界作为考察对象,以帮助我们回到那个本真的、未被我们赋予各种形而上解读的世界,面向人的现实生活,恢复人类的实践理性。哲学也由此不再试图像自然科学一样追求关于世界的全面的知识性认识,而是寻求对世界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建立一个能够支撑主体间共同存在的意义世界。

参考文献:

- [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 [2]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3]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李幼蒸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4]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夏基松、张继武校[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 [5] 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6]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7]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8] 汉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第二卷,洪汉鼎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9] 汉斯·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夏镇平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 [10] 汉斯·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高地、李河等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 [11] 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12] 野家启一:“哲学的终结”与“终结的哲学”——罗蒂所进行的哲学的“反构造”,刘绩生译,梁吉贵校[J].日本《理想》杂志.1984(1).

作者简介:黄在忠,男,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研究方向:外国哲学。

责任编辑 / 陆一霖